张文标：中国的民间趣味，在年画里

文/图 沈嘉禄

山东杨家埠年画

年画收藏家张文标

▲上海旧校场年画

▼《四美图》在中国年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壹 鲁迅也是中国年画的粉丝

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画，汉朝以前就已经有了。据晋代《荆楚岁时记》记载：“贴画猫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与此相关的还有神荼、郁垒缚鬼的传说。到了唐代，门神普遍传为秦叔宝、尉迟敬德的形象。宋代以后，门神画就逐渐演变为木版年画。各地民间艺人争相仿效，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乡土风格。明代是中国古代版画艺术的兴盛期，刻印技术之精，已明显超越前代。同时还出现了套版彩色印刷技术，为年画的繁荣提供了优越条件。

民间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中较大的一个艺术门类，它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祇信仰逐渐发展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载体，表达了中国民众在农耕社会时期的思想情感和美好祈愿。也因为它通俗易懂，物美价廉，拥有无数欣赏者，进而成为一个民间艺术的品类。中国年画不仅对民间美术的其他门类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与其他绘画相互融合，成为一种成熟的画种，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鲁迅对中国年画有浓厚兴趣，因为中国年画大多是木版套色印刷，所以他认为可视作近代版画的先声。鲁迅后来竭力倡导版画，也缘于他研究中国年画的经历与收益。鲁迅收藏的许多河南朱仙镇年画，现都藏于鲁迅纪念馆中。

贰 收藏年画就是跟老外玩“寻宝游戏”

临近春节，张文标在家里翻箱倒柜，忙作一团，他应三山会馆邀请，准备在那里举办一个年画收藏展。按展览要求，至少拿出300件有历史感的年画精品，其中包括上海旧校场年画。此为近半个世纪来难得一见的珍稀品种。

见到张文标后，他第一句话就是：“选出来的300多张年画中，90%是孤品，从数量上说，只是我收藏年画中的1/10。”

在方兴未艾的民间收藏中，年画是一个冷门、偏门，素来不为藏家重视，为何张文标对它情有独钟呢？

张文标说：“我最早收藏的是连环画和各色画报。上世纪80年代末，我看到吴友如的《点石斋画报》影印本，大吃一惊。吴友如在照相术尚不普及的当时，借鉴了西洋画的手段，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图像资料，是今天我们研究清末社会现象和人文思潮的文献。后来我一有空就钻到旧书店里淘旧书，连环画、画报、木刻画册等，我都一一收入囊中。几年后，我收藏的连环画已堆满了书房，后来有人要编一本《中国连环画集锦》，就到我家来翻拍资料，给了我1万元资料费。”

有一天，张文标到城隍庙逛地摊，看到一大摞旧书中夹了一张老年画。他捡出一看，是一张彩色关公像，尺幅也有对开那么大。这个旧书摊主对年画没有感觉，张文标就以较低的价位购得。这是他收藏的第一张年画。

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已经“宝哥哥，你来迟了”。这时，国内收藏家对年画还莫知莫觉，但老外已经“悄悄地进城，打枪的不要”了。清末民初的老年画，品相好一点已经叫到1万元。而且同一件年画，卖给老外的价格是卖给中国人的10倍，古玩店老板当然要以“国际友人”为重点关照对象。

好在张文标与古玩市场的老板混熟了，人缘还不错，人家就愿意留一些给他。据张文标说，近三十年里，不少西方学者在大学基金会的帮助下进行专题研究，写了论文，出了专著，有的还开设了专题收藏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就有一个中国年画研究所，日本学者到中国来收购年画，再高的价钱都要。而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的学术机构关注土生土长的年画。将来中国人要研究年画，恐怕还得到欧洲、日本去呢！”

凭着一股与老外抢宝贝、为中国文化保存一株根脉的劲头，张文标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扑在年画搜求上。十几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北京、南京、天津、开封、扬州、苏州等地。有一次，他在北京古玩交易会上收到一对山东杨家埠的年画《麒麟送子》，尺幅很大，而且人物开脸是手工的，与天津杨柳青年画的技法极为相似，很有研究价值。事后有老外希望他出让，被他谢绝了。这对年画将会在此次展览上亮相。

叁 《四美图》的故事

张文标曾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一张钤有“浙绍墨润堂印”印章的老年画，与一叠旧画报一起被他购进。后经翻查资料才知道，原来这是一幅极为珍贵的年画。虽然是清代复制的，但它的母本却颇有来头。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帝俄时代的一位军官柯兹洛夫潜入我国甘肃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古塔内盗掘西夏文物时，偷走了一张年画，这张年画就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俗称《四美图》，年画上画着汉代的赵飞燕、王昭君、班姬和晋代的绿珠四位美女。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年画，出自平阳（今临汾）刻坊。画上盖有“平阳姬家雕郎”的店铺字样，足见在当时年画生产已具规模。1915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狩野直喜博士游历欧洲时，在俄罗斯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现东方博物馆）内看到此图，于是设法将其影印件带回日本，并在几年后撰文在杂志上予以介绍，认定它的制作年代应该在金代。作品由此引起东西方各国对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的高度重视，《四美图》也被世界美术界公认为中国版画史上划时代的作品。现在山西襄汾丁村民俗博物馆中也藏有此图，是从俄罗斯复制回来的。而张文标收藏的这张清代复制的《四美图》，也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此次，张文标为了增加展览的文化分量，小心翼翼地将它请了出来。我提前欣赏了这张年画，四大美女身上的衣纹流畅灵动，神态安详，体态丰盈，举止雍容，加之边框装饰也精美妥帖，充分展现了当时匠人高超的构图布局能力和刻版技术。

肆 从旧校场年画看海派文化

为了呈现中国年画的整体风貌，张文标特地拿出了几大年画基地的代表作，北起天津杨柳青，南至苏州桃花坞，荦荦大端，疏而不漏。三张苏州桃花坞的精品年画，是他从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上觅来的。还有数张四川绵竹的年画，可能是清朝的老木版，在上世纪80年代重印的。河北武强的年画和朱仙镇的年画也有十几张。山东杨家埠的年画最多，大红大绿，民间趣味甚浓。而难得一见的上海旧校场年画，则是在上海云洲古玩城里搜到的。

上海的观众对上海本土的年画自然更感兴趣，但长期以来，上海旧校场年画在古玩市场上很少露面。这或许是一个谜。

老城厢的旧校场是建于明代的一个演武场，19世纪中期，旧校场出现代销苏州桃花坞年画的店铺。由于获利丰厚，有些店就自己刻印年画，聘请苏州桃花坞的画师、工匠绘稿并制作，行销颇畅。旧校场年画除在上海自销外，还返销苏州。1860年太平军东征期间，不少桃花坞业主和工匠为躲避战乱来到上海，在旧校场重操旧业，使上海的年画市场繁荣起来。

清同治、光绪年间，旧校场年画盛极一时，在短短200余米的街面上聚集了几十家画铺，著名海派画家吴友如、钱慧安、改琦等积极参与了年画创作，在提升艺术境界的同时兼顾了平民化、大众化，做到了雅俗共赏。

上海收藏协会会长吴少华对我说：钱慧安对上海年画贡献最大。钱慧安放下画家的架子，从繁华的上海滩只身来到天津的杨柳青，生活在画工艺匠之间，汲取民间艺术的元素，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观的作品。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在画市上张贴出他的画样，任人购买和评议。这段史料记载在清末蔡绳吾著《北京岁时记》中。

上海图书馆藏有三千多幅老年画，其中有不少旧校场年画。我曾在那里看到一些相当有上海开埠城市特色的年画，比如《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各行各业风情图》《新出夷场十景》《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西国车利尼大马戏》《海上第一名园》《西洋斗鸡》等，表现的都是世上风情、新事物及日常生活的新面貌。在新闻业还不发达的那个时候，旧校场年画还承担了新闻报道和新观念传播的使命。

旧校场年画发展经历了木版手工拓印时期、石版印时期和胶版印时期，完成了由木版印向石印和胶印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旧校场年画也浓缩了中国年画的印刷技术演进史。

母爱的本能

□何小琼

在网上看过一组照片，主题是：爱的本能。简简单单五个字，十几张黑白照片，据说现在网上正火，转载和评论都超过百万。我便是眼濡湿着看了一次又一次。

第一张，显然是在一场毁灭性的地震之后拍摄的。四处是倒塌的房屋，抢救人员正极力挖掘。一个角落，三位抢救人员默默地低头，似乎在致敬。仔细一看，一块巨大的石板下，仅仅容身的极小位置中，一位年轻的母亲紧紧地抱着一个最多两三个月大的婴儿。照片中的孩子，正涨着脸流着泪大哭，而母亲已经没有了气息。

第二张照片，是在一个人来人往的车站。一位年轻的母亲背弯成了弓，背上背着一个大得惊人的鼓鼓的麻袋，里面装的是什么看不到，但这高度显示它不会轻，所以压得她不得不弯着腰。她穿的粗布衣已经多处破烂，脚上的鞋子露着脚趾。负重肯定使她步履艰难，但她却是笑着的，笑容充满慈爱的光芒。哦，她的怀里，细心地护着一个孩子，大约有五六个月。小家伙可爱极了，眼睛大而闪亮，正滴溜溜地看着来往的人群，那么好奇和兴奋。他并不知道，母亲为了他舒服些，正把腰弯得更低。

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照片，我一张张看下去，每一张都在诠释着母爱的故事。一个个平常人的故事，需要豪言壮语吗？需要有多惊天动地吗？不用。点点滴滴中，已温暖了初冬里的我。

我想起了去世已三年的母亲。

曾经几时，心直口快的母亲总是对我严厉之极。无论是酷夏还是寒冬，她从不让我消极对待学习，稍一松懈，就会被罚站。以至于我一度以为，母亲是不疼爱我的。但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父亲正出差在外，7岁的我突发急病，腹痛不止。弱小的母亲麻利地帮我穿好衣服，背起我就冲向医院。外面还下着雨，母亲只给我穿上了雨衣，自己因为背着我，无法打伞，很快就淋湿了。我只知道母亲一直在跑，唯一有一次脚滑，母亲只单脚一弯，用膝盖顶住，就站了起来。她仿佛有着无穷的力量，一路不停地把我背到了医院。医生将我送进手术室时，母亲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后来医生说，要是再晚到10分钟，我也许就性命不保。而父亲说，母亲自小就体弱，想象不出来那晚她是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能背着我一路跑到医院的。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母亲为了我，是能够付出一切的……她对我的严厉，只是对我期望高。

有人说，任时间流逝，人类爱的本能从不会消失。我相信，母亲对孩子的爱也是一种本能，永远不会消逝。

父亲梦里丢了我

□梁凌

父亲患了阿默海兹症。他常常丢三落四，刚刚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很快就忘记。严重时，他甚至认不出家人。

我工作忙，但一般三两天会回家看他一次。最近因单位搬家，有一周没回，周末我回家时，父亲正在睡觉。他脸朝着墙，浑身颤抖不停，手挥动着，嘴里不停地“啊啊啊”。我赶紧上去拍拍他。父亲醒了，满脸泪痕。

我问：“爸爸，你怎么了？”

他看了看我，问：“你是谁？”

我说：“爸，我是你的女儿呀！”

父亲突然抱头痛哭：“女儿？我的女儿丢了。我把我的女儿弄丢了！你不是我女儿，我女儿扎着辫子，辫子上缠着我给她买的红皮筋。”

我说：“爸，我没有丢，我不是在你身边站着吗？”

父亲流着泪说：“刚才我把女儿弄丢了。我带她去赶集，集上人特别多，我准备给她买点牛肉吃——她最好吃牛肉了——一转头，她就不见了，肯定是被人贩子抱走了。天哪，我蹲在墙脚，不停地抽打自己的头，我再也没脸回家了，我把我的女儿弄丢了……我只有这一个女儿，她可是我的命……呜呜……”

我的泪，也开始“哗哗”地往下流。

我在记忆里仔细搜索。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三四岁吧，好像是被弄丢过一次。那次是跟父亲赶年集，集上人特别多，挤来挤去的。父亲一会儿抱着我，一会儿让我骑在他脖子上，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把我放了下来，应该就是他说的——去给我买熟牛肉吃。而我可能被什么东西吸引，或者是棉花糖，或者是糖葫芦，就往边上走了几步，看了一会儿热闹，然后又拉着“父亲”的衣角，被人潮推动着继续朝前走。走了一会儿，看见卖气球的，便扯着“父亲”的裤子闹起来：“爸爸，我要气球！”却听见头上有一个声音炸响：“呀，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拽着我的衣服，你家大人呢？”我抬头一看，我牵住的，是另一个伯伯的衣角，他穿着跟父亲一模一样的黑蓝裤子。我又羞又怕，像兔子一样跑掉。可我找不到父亲了，只能边哭边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我记得来时，我骑在父亲脖子上，见过一头拴在杨树上的大黄牛，还有一条小河，一座黄泥茅草屋……凭着这些，我在黄昏时摸回了家。这让母亲大惊失色。而父亲很晚很晚才回来，看见我，他一把抱住，哭得很凶很凶，就像今天，谁劝也没用。

这些往昔记忆，竟深深印在父亲脑海里，如今仍时时会做恶梦，并为此哭泣不停。

如今我站在父亲面前，他却已不认得我。

可能因为我最近没回家，父亲想我了？多希望在父亲的意识里，我还是像当年一样，只是暂时“走丢了”。

烙在心底的记忆

□魏亮

几位同事要一起出差，办公室文秘说要统计身份证号，给大家统一订机票。王姐竟有些尴尬地怎么也说不准自己身份证号码的后四位数字了，最后不得不在众人善意的笑声中，去翻出皮夹里的身份证确定。王姐讪讪地笑说：“唉，上学时文言文《离骚》都能背得一字不落，现在是真老了，有时连自己的手机号都要想好一会儿。”

我们都安慰王姐说，现代人依赖手机多了，都越来越健忘。但我告诉王姐，记不起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有时还真不是小事儿。不久前我过机场安检，安检员看看我的身份证，又看看我，竟突然要我说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我虽然快速地说了出来，但后来一直在想，如果我说不出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麻烦事呢？

其实再难记的东西，如果反复练习，总是能记得住的。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还是部队里的一名文书，当时被连长推荐到团部机关担任打字员。初学打字时，即将退伍的老打字员甩给我一张八开纸，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机盘上千余个常用文字，他说全部要背下来。我脑袋顿时“嗡”的一声——这太难了！他还告诉我，这没有任何规律可言，只能死记硬背。我全凭强记才勉强可以上机，但刚开始打字很慢，直到一年后，我才能熟练打字。但部队这时又采购了新型号的电脑替代原始打字机，我不得不再次从零开始，又去背诵王码五笔字型的键盘表口诀。“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

有些扎根记忆深处的东西就是这样，即便不是什么刻骨铭心的事，日常能想起来的机会也不多，但无论时光之水如何淘洗，它们都不会被轻易过滤去。当时感觉难如登天的口诀，我至今仍然可以脱口而出。而我退役后换了工作，十余年都没有机会再碰电脑。有一次当我又坐在电脑前，双手搭在键盘上的一刻，十指依然翻飞如故。

虽然在背诵之初可能经历痛苦，但不经意间，某些记忆就如烧红的烙铁印在心头、融进血液，历久弥新又被想起时，何尝不是一种小确幸呢！

2019年12月30日那天，我们单位给当月过生日的寿星开生日会。主持人把话筒递给我，要求在辞旧迎新之际给大家说一句祝福的话，我稍一思索，便脱口而出一套多年前曾用心背诵过的“拜年嗑”：“在2020阳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祝所有同事和家人鼠年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事吉祥万事如意！”当我一口气说完，台下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和叫“好”声。

什么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要我们下过工夫，有些事还真是终生受益。

制图/肖莎

“乡音”征文 作品选登

儿时“泥仗乐”

□陈灿富

又一次回到老屋，已是秋天时节。端出一张长板凳坐在晒场上，悠闲地与乡亲聊天。临近黄昏，晚霞满天，一轮夕阳慢慢地往山下滑去。抬头望去，门前经已收割的稻田上，堆着一个个草垛。

忽闻一阵熙熙攘攘之声，七、八个脸带童真的孩子，追逐着奔进田间，急急忙忙在犁开的田里挑拣泥团，再分成两个小组，各自躲在相隔不远的草垛后面。

望着那群拾泥团的孩子，我不无怀念地说：“孩子们这是又要进行‘泥仗乐’了？”“泥仗乐”是我儿时的记忆。前些时候，在海外看中文电视，一部纪录片的内容恰是讲述我们广东岭南的人和事，其中部分场景便是孩童“泥仗乐”，当时便勾起我对往昔岁月的许多念想。想不到今次返乡，能再次亲眼目睹孩子们“泥仗乐”。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乡村欠缺文化活动。每到水稻收割后，孩子们随时都会来一场最爱的“泥仗乐”。人数不限，分为两组，双方隔着一段距离。一方有人发号施令：“开始！”大家便弯腰拾起泥块，你来我往地扔掷。直至双方气喘吁吁，累得手臂酸痛才结束。游戏中从来不分胜负输赢，谁也不会有砸中对方之心，在乎的只有其间的嬉戏玩乐。

记得当年，我们有8个男孩子最爱一起玩这个游戏，每每玩到浑身疲惫、无心再掷出泥团，大家才拥在一起揽头挽颈地休息。后来，我们中间领头的祥哥参加中学生运动会“铅球”比赛时，曾一举获得冠军，名字还上了本地报纸，或许就与我们当初的“勤奋练习”有关吧。

我掏出手机，拍下孩子们在田间“泥仗乐”的画面，发给身在海外的家人朋友们分享。他们也怀念地说：“以后找机会回到老家，要能如孩子们一样再来一次‘泥仗乐’多好！”我快活地说：“我现在就好想参与孩子们的‘泥仗乐’，即使弄得浑身上下好像泥猴子也无妨。”

的确，无论过去抑或今日，“泥仗乐”于我们而言，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民间游戏，更是长在我们心坎深处的童真。我反复地看着用手机录下的孩子们玩“泥仗乐”的视频，不由感慨：儿时我们在老家学会玩耍的民间游戏多得很，只是如今很多游戏都被人遗忘了，不再有人玩了。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科技发展得令人惊叹，文化娱乐活动也丰富多彩，比如手机、互联网上的电子游戏就层出不穷。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电子游戏不少也是融合了民间游戏的精华与智慧的。所以，我期望老家的这些孩子们，除了学习先进科技知识外，每年秋天还是应该到泥田里继续玩一玩“泥仗乐”，这样才能够将乡村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啊。

本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com，并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题，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身份证号码。

统筹/易芝娜